

伟人邓小平
从广安走向红色中国
袁永松

红旗出版社
北京沙滩北街 圆号

陽昇苑景緣原武緣原冠觀·園苑

伟人邓小平

从广安走向红色中国

袁永松

红旗出版社

目摇摇录

早年岁月	(员)
一个伟人来到世间	(员)
这位伟人的革命步伐是从广安出发的	(圆)
到法国去	(猿)
高级钳工	(源)
油印博士	(缘)
在列宁主义的故乡	(远)
在西北黄埔	(苑)
在红色的风暴中	(愿)
第一次当秘书长	(愿)
百色红了	(怨)
两军总政委	(员园)
幸福与不幸	(员员)
经营左右江根据地	(员圆)

铁流千里	(员苑)
刀下释冤魂	(员苑)
首任中央政府“ 父母官 ”	(员苑)
会昌城外高峰	(员苑)
毛派的头子	(员苑)
“ 红星 ” 闪闪亮	(圆缘)
在长征路上	(圆缘)

早摇年摇岁摇月

一个伟人来到世间

1926年 愿月 圆日（农历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户农民家庭。父亲邓绍昌为他起名邓先圣。上私塾时，塾师认为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欠恭敬，给他改名邓希贤。邓希贤这个名字，他用了 愿年。

关于邓小平的故乡，他的女儿毛毛是这样描述的：

广安县一眼看去就知是一个古老的县城。虽然已有不少现代化的建筑，但更多的还是那种典型的南方老式房屋。街边大多是两层的砖木结构的小楼，清一色刷着白色的灰墙，楼上往往有一排木栏杆围着的凉台。广安看样子真是出产石头，县城的街梯和房基都是用一块块的方石砌成。我们还看见路边有一些石槽，可能是洗衣洗菜用的。

在一条商业化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日用百货琳琅满目，现代化的商品经济已经进入这个小小的山城。在街上行走的，有挑着竹筐和背着竹箩的乡里人，也有穿着相当时髦的年轻人。那些红黄蓝绿各色服装，那些大城市也只有时髦人才梳的流行发式，以及那些街边陈放着的彩电和音响，构成了这个偏远山乡的现代意识。

汽车与牛车，彩电与竹篓，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特色。

一下子摈弃贫穷和落后，在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毕竟已经开始起步，向着富足和强盛迈进。

你们看看这些农民，他们的田里禾苗油青，他们的筐里稻米沉沉，他们不再赤脚，还穿上了西装，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呀！

四川人好吃，那些摊子上，架子上，摆的，挂的，都是肥肥鲜鲜的鱼、肉和圆圆滚滚的川味灌肠。街边小摊贩的锅里正热气腾腾地煮着各色各样美味小吃。这里鲜嫩的青菜、萝卜、豆苗、蚕豆，都是城里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可能因为是故乡的缘故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已经爱上了这块地方。

我们的老家，叫协兴乡，离广安县城还有二十里路，因此我们看罢县城，就又急急上路，直奔北边而去。

在出城的路上，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渠江。

渠江是长江的上游支流，发源于川东北部山区。渠江从东北顺流而下，与西面的嘉陵江会合，再一起汇流而入长江。我们看到在山壑之间，渠江之水浩浩荡荡地奔流，虽不如长江那样的雄伟和宽阔，却已有了长江的激荡。有水就有

生命。虽然在几千年中，它也曾溢涨成灾，它也曾对旱魃袖手旁观，但它今天已经成为我的故乡人民的生命之水，幸福之水。

汽车离开了大道，进入乡间。这才真正显露出故乡的本貌。这里已不属于成都平原，是标准的丘陵地带。平原一望无际固然很美，而丘陵的起伏就更多了一层韵味，更多了一份浪漫。恰值这时雾也散了，天也晴了，在秋日的照耀下，一切都鲜鲜亮亮，暖暖洋洋，令人心情豁然开朗。

北方的 10 月已近冬天，叶开始落，草也开始黄。而此处则不论高低，不论远近，都是郁郁葱葱的绿。田是一块块的，鳞次栉比。水稻已经收了，田里又长出了高高的稻草，散散漫漫地等着人们来把它们翻耕进地里，以作为来年的肥料。

据我姑姑说，她们小的时候，谷草割得很干净，用来烧火，因为广安无柴。而今天，人们做饭多用煤，稻草留在地中则可作肥。肥好，土就黑，明年的苗就壮，谷粒就会饱满，人们就可获得丰收。

田地之间，常常看到一家一户，或几家几户的房舍，这里虽不像一些富裕地区那样能盖楼房，但也不再是旧时的茅草房。宽大的青瓦灰墙的农舍，大多与一蓬蓬的绿竹相掩映。这竹可真美呀，有树那么高，头像凤尾一样地低垂下来。平平常常的农田农舍，一下子因为这竹而变得富有神韵起来。竹林的浓荫下，一定有说不出的凉爽惬意，一定发生过讲不完的动人故事。

这竹，好像就是农家的魂。

田边上，路边上，山坡上，池塘边，房前屋后，到处都

种着菜。菜叶子绿莹莹的，绿得发黑，一看就知道肥水俱足。在北京的时候，家乡的人常常趁便带来一些各式菜蔬。我们只知道四川的菜远比北方的好吃，而今天才知道，四川的菜种得更是特别好。姑姑说，四川人会种菜，又珍惜地，连巴掌大的地方都要种上菜，而且种得像绣花一样精细。无怪乎四川的菜价如此便宜，就连成都人到了北京，也总抱怨北京的“生活不好”。

广安的土质没有成都平原那么好。山坡上的土就更差了，连草都长不茂盛，这是当地人告诉我的。可是我看到的却是满山的绿树。一问才知，这些都是柑橘树。啊，这柑树橘树已经成林，在山上、丘上连成一片。柑子树下又多种的是菜，景观十分美丽。姑姑说，这些树都是这十来年才栽种的。黄土上草都不生，怎么办呢？于是政府推广，八毛钱买点火药，在土石山上炸一个坑，种一窝橘。就这样一个坑一个坑，一个窝一个窝，柑橘之树种满了山，连成了片，长成了材，结出了果。柑树橘树绿了山，富了民，乡里的人都说还是共产党好。

从小就听奶奶讲，广安有山，山上有棵黄桷树。这回我真的看到那黄桷树了。

广安的山是缓缓的，顶是平平的，而山顶之上，就有那么一棵黄桷树孑然挺立。这树树干挺拔，树冠巨大，远远望去好像一把张开的伞，一幅打开的旗。奇怪的是，这树总是站在最高的山顶，而且每个山顶只有一棵。真不知是天造？还是人为？反正它就是那样的特别。别人都低它独高，别人都平它独耸。久日不归的游子望见它，就像已经回到了家园。出门在外的故乡人离开它，却永远不会忘记它。

这傲然高耸的黄桷树，就像是这山川的神。^{〔周〕}

邓小平的故居也给毛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写道：
到了，这就是父亲的出生地，我们的老家。

门前已修了水泥路，路两边种了花草，还种了芭蕉。当然，这些都是现在修的，是乡亲们的一点美意。原先，这门前的坝子，这路，则都是土的泥的，更不会有花草芭蕉。

和别的农舍差不多，这房也是白灰抹的墙，木头搭的门，青瓦盖的顶。一排正房略高一点，两边的偏房各有数间。左中右三面房子的中间是一个平平的坝子。当年，一定有许多鸡鸭环游这房前屋后。听奶奶说，他们还养过几只鹅，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看家。鹅的叫声大，啄起人来也很厉害，却又不像狗那样凶狠，所以这里的人就用它护院。

在正屋大门的上方，悬有一个木匾，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邓小平同志旧居”。

我跨进屋内，顿觉一阵荫凉。

这几间屋子内陈列着一些照片，都是父亲各个时期的，有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有八路军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还有解放后的。啊，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是五十年代我们的全家福，那上面还有我呢！

有一间屋子里挂了一张不知谁画的父亲的像。画上的父亲站在那里微笑，手指缝里还夹着一支烟。他的前面是盛开的鲜花，后面是浮云缭绕的高山。画的技术并不高明，但却带有乡土之气。画的两边有一副对子，曰：“政通人和千家乐，国富民强万户欢。”这副对子的字绝不是出于名家，但意思却是出于人心。

左边的那排房子里，放着一张床，还有一个柜一张几，都是陈年的旧物。这床很特别，上好的木料，宽宽的床架。周围有围栏，上面有顶棚。围栏和顶棚都有木制雕花，当年一定很是好看。这个床如果是新的，再配上绸缎的床幔，一定相当富丽堂皇。只不过它现在已经黑了，旧了，不复当年风采。人们都说，这是我祖父祖母的床，说我的父亲是在这个床上出生的。但我的姑姑和县里的人告诉我，当年土改的时候，邓家的物件都分给了乡里农人，后来收集父亲家的旧物时，才又从农人家找回来。因为当地这个样子的床很多，究竟是哪个也搞不清楚了，所以就从中挑了一个。

不管是与不是，我想都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能从这个床，这个柜，这个几，看出旧时代的轮廓就可以了。

父亲这个人，历来就不爱注重一些枝端小事。对老家的旧居，他从来就没有过问过，更不愿让人家把这里搞成什么旧居陈列室。从解放以后，我的奶奶和其他亲属离开老家以后，这片房子就在土改中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大概有十来家人住在这里。直到 1957 年到 1958 年间，这里的人生活逐渐好了起来，有了钱盖了新房，才逐渐搬了出去。这样，这个房子才专门改为陈列室，供来人参观。

父亲的一个亲舅舅，在我回老家的时候尚在人世，虽然他不是邓家的人，但他长年住在邓家，直到前几年盖了新房，他也才随家人搬出了邓家老屋。我去看过他的新居，竟是一座二层小楼。他周围的乡亲们也都住上了这样的楼房。有了楼房，谁还要去挤住在那老房子里呢！老房子自然就腾空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父亲绝不会允许人家把乡亲从他的旧居迁出的。

从后边的小门转出去，一眼就看到，老屋的房后，长满了翠绿的竹。这竹真茂盛啊，种下几棵，立刻长成一片。细的恰如纤纤少女的玉指，粗的可比健康小伙的手臂。这竹叶边长边落，边落边长。你看地下已铺满掉下的黄叶，而竹枝上却依然绿羽苍翠。这竹大概已经在这里长了上百年，可是却永远显得那么精神百倍，仿佛比我还年轻。我真想搬个小竹凳，拿上一把青竹扇，在这小竹林中坐下，静静地，静静地，听一听竹叶的沙响，闻一闻竹枝的清香，透过那茂茂密密的枝叶，去看太阳……

这不是我的家，这也是我的家。我一点儿也不熟悉这里，却甚感亲切。我从来也没来过这里，却一到如故。因为，这是我父亲的出生地，这是我祖辈生活的地方。

在旧居的门前，挂着一副长联。这联用金色的字迹镌刻在门的两边。

这联上写道：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

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

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联是四川著名文人马识途写的。作于公元1984年秋天。

据这里的人告诉我们，来广安的外地人并不多，来这小小协兴乡的人就更少。但凡来此地的人，都来这旧居参观。还有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了考证，或者只是为了看一看。

在老家，我们最后还去看了一下祖父的坟和祖母的墓地。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人挖掉？

祖父的坟在离家不远的一块地里，坟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邓绍昌之墓。是丁丑年，也就是 1927 年立的。

祖母的坟则在一座山上，那里还埋葬着邓家的几个更老辈的祖母。这里埋葬的我的祖母，是父亲的亲生母亲，姓淡，名字不知。父亲二十二岁的时候她便死了。她的墓碑是以她的儿子们的名义给她立的，其中还有父亲的名字。其实，那时父亲远在异国他乡，恐怕根本不知道立碑的事情。

那次回老家的时候，我以为祖母的墓地就是我们家的祖坟。后来才知道，我们邓氏家族的祖坟在另一个地方，要走很远的路，坐船去。我们家的老祖宗们可能都埋在那里吧。在旧社会，只有家族中的男子才能去祖坟祭祖，女子是不能去的。^{〔图〕}

毛毛还对邓小平的家世做了一番考证与研究，她写道：《邓氏家谱》，从明时始，记至民国初年。

上面写明：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洪武十三年（即 1380 年，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

.....

明代的二世祖，即邓鹤轩之子，名叫邓显，字梅庄。据说此人以文行魁蜀，蜀献王闻其贤，屡聘之仕，皆不应。他的事迹曾载于明代广安郡志。此乃邓氏之一大贤人也。

明代的第八世祖，名叫邓士廉，字人麟，明朝崇祯进

士。其人慷慨负气，经史子集过目不忘。曾任广东海阳令和吏部侍郎。明末随桂王入滇缅，官为吏部尚书晋大学士。清朝顺治十八年秋，为缅人所诱，与其他四十一位大臣同时殉难。乾隆四十七年赐谥节愍。此乃邓氏一大烈士也。

邓士廉有一叔伯兄弟，名叫士昌，字龙门。明朝万历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之职，后升任浙江处州府知府。其地地瘠民疲，于是尽力抚绥，修堰灌田，民受其利。遂被荐擢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永州道兼摄衡州道。后为人所忌，劾归家乡。此乃邓氏一大贤臣也。

以上是邓氏家族明代的一些先人轶事。原来只知邓家清有翰林，乃不知明亦有忠臣烈士呢！

自清代起至今，邓氏家庭又繁衍了十代有余。乾隆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而这时远在西南一隅的小小邓氏家族也处于兴盛时期，竟然光宗耀祖地出了一个翰林。好像是盛极必衰，风光一时的邓家至此以后竟然逐渐地衰败了下来，书香墨迹不但渐渐无人继承，就连耕田地亩也渐渐失去。据亲戚们讲，到了最后，就连那个最为神圣的翰林的家——翰林院，也穷得卖给他姓了。可见家道中落如此。

前面讲过，邓氏明代八世祖邓士廉曾任过广东的海阳令，后来在滇缅殉国。他有一个儿子，叫邓昉。是邓氏明代最后一代，也就是第九个世祖。邓昉于明末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赴粤东其父之任上。这一家人行至广东高耀县（家谱上如此记载——作者注）三义河的时候，遇到海贼劫夺，举家溺水而死。所幸的是，在海贼之中居然有人发了善心，将邓昉的两个儿子不杀，抛置岸上。邓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邓嗣祖，时年七岁。一个叫邓绍祖，年方四岁。

邓嗣祖，字绳其，乃邓氏清代的一世祖。嗣祖七岁时随父赴粤，在高耀县三义河遇难不死。其时父母俱丧，仆婢尽亡，钱物全无。嗣祖携弟绍祖沿路乞食，流落到一个伍家村。伍家村有个伍员外。伍员外询问了这落难的兄弟二人的来历，大概很喜欢他们，于是大发恻隐之心，把这兄弟二人留下，供其食用，还于书舍教其文学。等嗣祖长大以后，伍员外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不久，嗣祖在广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邓琳。邓嗣祖在广东的时候，因遇考，得遇一个其祖父邓士廉的故人之子李仙根。这个李仙根当时恰为督学使者。这时李才告诉嗣祖其祖父邓士廉殉难之事，并谕令嗣祖回籍。想嗣祖此时一定大悲大恸了一番，然后带领妻儿及弟弟绍祖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回到四川。嗣祖、绍祖流落在粤二十八年，终于返回故乡，承继家业。据称，嗣祖为人存心仁厚，为乡里称颂，可能与他少时的艰苦际遇不无关系吧。这一段故事，可能是邓氏家族中最动人的一页篇章了。

邓嗣祖一共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在广东生的邓琳，一个是回籍后在四川广安生的邓琰。邓琳生有六子，邓琰生有四子，从此广安邓氏遂分为两大房。邓琳一支为长六房，邓琰一支为二四房。从他们的孙子辈起，开始立下字辈，即是：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荣。我爷爷这辈是绍字辈，父亲这辈是先字辈，而我们这辈，我认为是最难听的型字辈。

还是先说老祖宗吧。

邓琳，字石山，三岁随父从粤东归回四川。据县志上说，他髫龄即能为古文辞，长大后穷研经史，尤喜谈经济。

雍正十三年（~~乾隆~~1736年）任中江训导。训导乃是一种学官，府、州、县学都设训导。中江是清朝四川中部的一个县，因此邓琳的这个训导是县级的。民国时期，各高等学校的训导是专门掌管学生的思想品德的，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清代的训导，则没有这种功能，只是协助同级学官教育所属生员（学生）。可能因为邓琳学识不浅，又为人教育者，所以教导有方。其长子简临、三子亮执同榜甲子举人，第六个儿子时敏中了进士，还作了个翰林。

邓琰，字映华。家谱说他业儒未成，大概就是说学无上进，只好务农了吧。邓琰为人轻财好义，故能够承继祖产。他对邓琳的儿子视若己出，见侄子邓时敏好学，就送给他价值三百挑谷的田地（约合六十亩地）以作膏火（旧时学生学习所用的津贴费用）。其人长寿，享年八十一岁。邓琰虽然学业无成，但看样子却持家有方。他一送给侄子就是六十亩田，证明他当时拥有的田亩至少几倍于此。这种家业，虽不如北方的豪门巨富，但在当地，可能也不算太小吧。我们邓家能够出个翰林，他的的确确是个有功之人。

邓翰林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现在终于该轮到他了。

邓翰林，名时敏，字逊斋，号梦岩。据县志所载，时敏性格温恭谦退，雍正十年（~~乾隆~~1732年）中举，乾隆元年（~~乾隆~~1736年）进士及第，遂进入翰林院，授以编修。

翰林，为古代的一种官名。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职掌撰拟机要文书。明清则以翰林院为“储才”之地，在科举考试中选拔一些人入院为翰林官。清代翰林院为大学士执掌，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时敏入翰林院后，虽只是区区一个编修，但对于当时的广安邓氏来说，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光宗耀祖的大事。时敏在翰林院后升为侍讲，历任江南宣谕化导使、翰林院侍讲学士、通政司副使，最后于乾隆十年（~~乾隆~~1745年）升任大理寺正卿。

大理寺乃我国古代中央审判机关，职掌审核刑狱案件，其主官称卿。大理寺大概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邓时敏所任的正卿，大概可以称为最高法院的院长吧！

邓时敏的父亲邓琳病故后，时敏奏请圣上，批准他回乡奉母。时敏回广安后，重修了广安州的州志。

乾隆二十九年（~~乾隆~~1744年），时敏再次入朝，官复原职。县志称，时敏任大理寺卿时，审理案件时常常苦心平反，有所得必争，争不得必奏。刚果持正，不稍迁就，同列皆畏敬之。时敏后来因年事已高，乞准告老还乡，诰受通奉大夫，六十六岁时在家乡去世。时敏有子无孙，因此现今世界上，已没有了他的后裔。

如果真如县志所言，那么这个邓翰林、邓大理寺卿，还真是一位有识有品，有学问有政绩的人呢。他的这一辈人，也的确是邓氏家族明清两朝五百年中最辉煌的一页篇章了。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份事业，要想上进，取得成就真是谈何容易，不知要费多少的心血，花多大的力气，用多少的时间。而成功之后要想衰落，则可能势如破竹，弹指可见。

事业成就，要靠天时，要靠地利，更要靠人和，还是人的因素第一。邓家的老祖先曾为官，曾为儒，曾有业，曾有田，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一步步竟往下坡路上走去。地

卖了，人也穷了。念书不成，做买卖也不成。^{〔獭〕}

关于邓小平的父母及其它家人的情况，毛毛也有详尽的描述：

前面说过，我的爷爷是 1905 年出生的。我们这一家人到了我爷爷这一辈，据说是三代单传，就是说三代人都只生了一个儿子。旧社会的中国，完全是封建的重男轻女。其实我的爷爷还有几个姐妹，但都不算数，所以我爷爷还是被称作“单传”。

我的爷爷叫邓绍昌，字文明，一般人都只叫他邓文明。我们从未见过这个爷爷，父亲也从不提起他的爸爸，只是从奶奶的嘴里听到一星半点关于他的事情。因此对于他，我们这些孙辈并没有什么印象，只是从小听见爷爷的这个名字，觉得很好玩，尤其用四川话一叫，更觉特别可笑。

最近我问了一些亲戚，才了解了一点爷爷的情况。

爷爷小时候读过一点书，但算不得知识分子。因为家里有了一些田地，他便不用再去种田，而是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他的阶级成份是个地主。但因田产不多，他这个地主充其量也只能是个小地主。

按照我叔叔邓垦的说法，爷爷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的人，他的思想和生活都是旧社会的，但对旧社会又不满意。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

1911 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广安县所在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北地区，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就受到了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就是重庆地区巴县人。邹容的一篇战斗宏文《革命